

蘇聯的東歐政策

畢英賢

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蘇聯頓獲良機，實現了沙皇俄國的夢想，將羅俄斯的勢力伸入東歐。蘇聯軍事佔領東歐，乘機扶植「人民民主」政權^①。蘇聯在東歐佔領國家內扶植人民民主政權的過程，除極少數例外，大致相似。首先把一小撮曾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當地共產黨人，塞進戰後組成的新政府，形成核心。然後，在蘇聯佔領軍、安全及警察部隊的庇護下，非共黨的政治結構被破壞，非共產黨人被逐出政府。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茨坦的安排，皆徒勞無益。在短短數年內，東歐國家一一被擠進蘇聯共產主義模型，被鑄成「社會主義國家」。

東歐各國成為共黨國家後，所謂社會主義世界體系業已形成。蘇共重新引用兩個陣營的理論，使世界兩極化，一個是社會主義世界，一個是資本主義世界。這兩個不同的世界體系必然會在一個歷史階段內同時並存^②。正如蘇聯自己所言，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國際關係的建立，乃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各自承襲了過去經濟、社會發展及民族傳統，存在着各種差異。因此，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中，勢必產生各種客觀與主觀的困難，或對各種對內對外的問題有不同的理解，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有不同的看法^③。

蘇聯為了傳統的國家目標以及共產主義革命理想，竭盡所能試圖把東歐共黨國家形成一個整體，團結得像一塊石頭，但是，事與願違，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東歐集團不斷發生反蘇、反共的事件，使社會主義集團內產生形形色色的分裂傾向。蘇聯對東歐各國的政策及實施這些政策的手段因而不斷調整，以適應集團的新變化。

註①

註②

註③

按照蘇聯共黨理論，人民民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一種國家政治組織的新形式。在人民民主的第一階段內，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為社會革命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人民民主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第一階段以鞏固共產政權為主，第二階段才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改造。
葛羅米柯(A. A. Gromyko)，波羅馬廖夫(B. H. Ponomarev)主編，《蘇聯對外政策》(Slozha Vneshnei Politiki SSSR) (莫斯科，一九八〇)，第一卷第十五頁。
葛羅米柯，同前引，第十二頁。

蘇聯在東歐的利益

俄羅斯人對東歐的野心有其歷史與地理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加上意識形態的理由。在過去數百年內，俄羅斯始終試圖在這一地區建立起唯我獨尊的影響力，不僅僅是勢力範圍而已。戰後，蘇聯視東歐為其安全的組成部分。幾個世紀以來，進攻俄羅斯的大部分外敵，皆經由東歐地區進入俄國領土。一九四五年以後，蘇聯順利地在這裏建立起一個在其控制之下的緩衝地區。同時，這也是蘇聯向西歐進取的跳板。在這個意義上，東歐各國就是蘇聯的軍事前哨。

從軍事利益看，東歐使蘇聯的國防邊界延伸至易北河（Elbe），使西方大國不能成為蘇聯的直接敵人，尤其是德國。德國分裂為東德與西德，更加降低了蘇聯所面臨的潛在威脅。從政治利益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使蘇聯成爲一個集團的領袖，與美國分庭抗禮，儼然兩個超強之一。從意識形態觀點看，東歐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使蘇共成爲這一體系的精神領袖。易言之，東歐成爲蘇聯式社會主義的試驗場，使蘇維埃制度含有普遍性。在大戰之前，蘇聯曾提出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之說，而在大戰後，則開始建設「區域性社會主義」④。從經濟利益觀點看，七十年代以前蘇聯從東歐各國取得多付得少，但七十年代以後則付出多回收少⑤。不過，蘇聯經營東歐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安全，其次是意識形態。在若干情況下，經濟已轉變爲追求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追求目的本身。

正如蘇聯所言，東歐各共黨國家成立之初，與蘇聯及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合作機構⑥。在四十年代內，蘇聯分別與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等締結雙邊條約。這些條約的內容大致相似，其中以相互協助、共同防止侵略爲主。這些條約構成蘇聯與東歐各國關係的法律基礎。六十年代以後，這些條約效期屆滿，於是蘇聯在六十與七十年代內再度分別與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東德等簽訂了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這些條約包含了一些四十年代的文件中不曾有過的條文。例如，在互利的雙邊基礎上與在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的範圍內加深發展社會主義國際分工，採取措施以達成全面裁軍，消除殖民主義，保護各國人民和平與安全，確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既定的歐洲疆界的不可破壞性⑦。這些以及其他雙邊

註④ 斯狄爾（Jonathan Steele），《蘇聯權力》（*Soviet Power*）（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第九十二頁。

註⑤ 同註④，第九十一頁。

註⑥ 奧斯托雅·奧夫夏尼（I. D. Ostoya-Ovshyan），斯契潘諾夫（A. I. Stepanov），《社會主義外交》（*Diplomatsiya Sotsializma*）（莫斯科，一九七三），第四十二頁。

註⑦ 奧夫夏尼（I. D. Ovsyany），鮑克希（E. Yu. Bogush）等，《蘇聯對外政策》（*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yuza*）（莫斯科，一九七八），第七十六頁。

文件與東歐國家間的多邊合作協定構成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相互關係的基礎。

事實上，蘇聯與東歐國家間最堅實的關係基礎是共黨與共黨的聯繫。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革命後，東歐各國皆成立了共產黨。這些國家的共黨爲了加入共黨國際(Comintern)，除了必須接受該國際的二十一條條件外，還得接受另一個未有明文規定的條件：各國共黨應服從蘇聯共黨的領導。三十年代起，蘇共領袖可以任命和清洗東歐共黨領袖，並爲他們制訂政策的基本方針。當時，蘇聯對東歐共黨絕對的控制有助於蘇聯境內各共黨派系的團結^⑧。及至各東歐共黨取得政權後，這種關係自然保存下來。

蘇共控制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原則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該原則首先由馬克思與恩格斯(K. Marx, F. Engels)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這個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各國的工人階段及其共黨先鋒隊與各國勞動人民應團結一致、協同行動、相互支援以對資產階級進行鬭爭，因爲資產階級乃是國際性力量。第二次大戰之後，蘇共解釋，這個原則也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中，於是蘇共提出一個新名詞：「社會主義國際主義」^⑨。本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並未要求某一共黨必須對另一共黨臣服；但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已意味著各國勞動者對蘇聯的順從。

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有兩個要點：(一)承認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平權、獨立與領土主權；(二)強調一切社會主義國家有團結與相互支援的必要^⑩。不過在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之後，蘇共給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加入新的要素：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斟酌自己的民族條件，決定自己發展的具體形式；但是當敵對的勢力試圖將某一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扭轉過來，恢復資本主義秩序時，當整個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威脅時，這已經不是該國人民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全體關心的問題了^⑪。有人把這個要素稱之爲「有限主權論」，有人則稱之爲「布里茲涅夫主義」。

整合努力與偏離傾向

註⑧ 鍾士(C. D. Jones)，《蘇聯在東歐的影響力》(Soviet Influence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1981)，第四頁。

註⑨ 布勞堡格(I. V. Blauberg)，潘金(I. K. Pantin)主編，《簡明哲學辭典》(Krakki Slovap Po Filosofii) (莫斯科，一九八二)，第一一七頁。

註⑩ 諾基(J. L. Noguee)，唐納森(R. H. Donaldson)，《第二次大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rymon Press, 1981)，第一九三頁。

註⑪ 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辭，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列寧主義方針》(Leninskii Kursom) (莫斯科，一九七〇)，第三一九頁；另參見「忠於國際義務」，《共產黨人》(Kommunist)，一九六八年第十三期，第十七至二十七頁。

儘管自由世界人士往往把東歐集團稱之為「蘇維埃帝國」，實際上與西方傳統的「帝國」差別甚大。第一，東歐集團各國在政治上都是主權國家；在法律上，是獨立的。第二，蘇聯在東歐沒有殖民地。第三，大部分東歐國家比蘇聯富有^⑭。所以蘇維埃帝國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名稱。蘇聯把它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 (Sotsialisticheskoe Sodruzhestvo Stran: Socialist Family of Nations)，但是這個大家庭內並不和諧。一方面蘇聯多方努力進行社會主義國家一體化（整合）；另一方面，東歐各國追求更多的獨立與自主。

蘇聯一體化的概念基於三個假定。第一，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性質與蘇聯境內各加盟共和國及各民族相互關係的性質一樣，都是源自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本概念。第二，社會主義國家，亦即華沙公約及經互會成員國家正沿著不可逆轉的、相互接近 (Sblizhenie) 的歷史過程前進。第三，這個相互接近的過程在三個層面上同時進行：在經互會架構內的經濟一體化；在華沙公約組織基礎上及實際關係基礎上的政治一體化；透過全面多邊與雙邊接觸的文化一體化^⑮。相互接近終將導致滙合 (sliyanie)，這就是蘇聯一體化的目標。

表面上，東歐國家對蘇聯一體化政策的反應不一，大約可分三類：羅馬尼亞反對；波蘭及匈牙利僅支持經濟一體化措施及協同一致的對外政策；東德、保加利亞及捷克則全面贊成^⑯。但是，實際上，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從東德到保加利亞，對蘇聯政策的支持在衰退中，在共黨精英中及人民中間不斷出現不順從與獨立現象^⑰。事實上，東歐各國對蘇聯以及蘇式共產主義的不順從與反抗，從東歐共黨集團出現之初就存在；除保加利亞外，都對蘇聯進行過挑戰。

在東歐集團內，南斯拉夫共黨領袖狄托 (J. B. Tito) 首先與史達林發生公開爭執。他們爭執的根源源自第二次大戰期間，例如史達林未能給予狄托所要求的軍事援助；戰後復試圖僱用南斯拉夫人在蘇聯特務機關服務。其後，南斯拉夫拒絕與蘇聯成立聯合股份公司、反對按蘇聯紅軍型態改組南斯拉夫游擊隊、以及狄托拒不奉召前往莫斯科。蘇聯乃於一九四八年把南斯拉夫逐出「共產黨情報局」。史達林死後，蘇共向南斯拉夫妥協，但南共始終保持獨立立場。

一九五三年，在捷克與東德境內發生了零星的工人暴動事件；但是能反映東歐共產集團內隱存的反史達林主義、反俄羅斯主

註^⑫ 斯狄爾，同前引，第九十頁。

註^⑬ 那科夫斯卡·哈姆斯東 (Teresa Rakovska-Harmstone)，「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與東歐——一個新階段」，〔觀察〕 (Survey)，第二十卷第一期 (一九七六春)，第三十八至三十九頁。

註^⑭ 同註^⑬，第五十一頁。

註^⑮ 鮑威爾 (S. Powell)，「莫斯科歐洲帝國之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U.S. News & World Report)，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八頁。

義及反共產主義的情緒的，乃是一九五六年波蘭暴動。更糟的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匈牙利在外交上與軍事上都退出蘇聯的控制。於是，蘇聯進行軍事干涉，革命勢力被鎮壓，親蘇匈共黨人重獲政權。

不久，阿爾巴尼亞在蘇聯共產集團內掀起另一場爭執。阿爾巴尼亞原是莫斯科的忠誠追隨者，但對蘇聯貶史運動及與南斯拉夫修好頗不滿意，因為阿共領導人大多是史達林主義者。阿爾巴尼亞終於脫離華沙組織，與蘇聯斷絕一切關係，投入中共懷抱。從一九六三年起，羅馬尼亞與蘇聯在不少問題上各執不同意見，例如對中共在國際共產運動中的地位問題、對華約存續問題、對各國在經互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在對西方關係上，羅馬尼亞獨行其是，獨立自主，不受蘇聯羈絆。不過，羅馬尼亞在內政上並無自由化跡象，未放鬆專政控制，也無民主化傾向。羅馬尼亞所追求的祇是不受蘇聯控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獨立。

一九六七年起，捷克境內發生政治自由化運動，進行國內政治改革，偏離蘇聯模式，對蘇聯構成重大挑戰。於是，蘇聯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夥同東德、波蘭、匈牙利及保加利亞打著華沙公約組織的旗子進軍捷克，鎮壓了這個民主化運動。對蘇聯而言，捷克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失去捷克，將失去東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起的緩衝區。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間，東德共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特 (W. Ulbricht) 在東西和解問題上與蘇聯意見相左，烏布利希特因而被迫退休。一九七〇、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波蘭相繼發生工人暴動事件，蘇聯利用政治壓力與經濟援助並指令波共自行解決。

東德原是蘇聯最馴服的東歐國家之一，最近兩者之間出現了裂痕。由於莫斯科和東柏林對西方關係各持不同意見而形成緊張，且引起華約組織國家內部的爭論。今（一九八四）年七月底及八月初，蘇聯嚴厲地責罵西德的「復仇主義」，並婉轉警告東德不要和西德加強聯繫，因為：（一）兩個德國的關係不能脫離國際局勢而單獨處理^⑭；（二）社會主義德國與資本主義德國就像水火一樣不能結合^⑮。捷克與波蘭的輿論傾向蘇聯，羅馬尼亞及匈牙利則不反對東德的作法^⑯。

這一事件在東歐集團中也許不會造成重大的分裂，但再一次證明，在蘇聯所導演的東歐集團國家相互接近的過程中，蘇聯經常面臨一些性質不同的挑戰。

蘇聯控制東歐的手段

註⑭ 班吉明斯基 (L. Bezymensky)，「在美國的飛彈保護下」(“Pod Sen'yu Amerikanskikh Rakety”)，[真理報] (Pravda)，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頁。

註⑮ 「在錯誤的道路上」(“Na lozhnom p'uti”)，[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第四頁。

註⑯ 鮑爾尼 (E. Bourne)，「莫斯科不贊成盟國趨向和解」(“Moscow frowns on moves toward détente by allies”)，[基督科學箴言報]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第九、三十六頁。

在東歐「相互接近」的歷史過程中，蘇聯對東歐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是，維繫其對東歐的控制。由於不同歷史階段內不同的情勢，蘇聯所採取的控制手段與態度各不相同。史達林的鐵腕手段與老子作風、赫魯雪夫的凡事武斷與老大哥姿態，以及布里茲涅夫的平易近人與兄弟論交等，部分也許是由於蘇共領袖的性格使然，但是極大部分却是基於客觀的形勢。例如，布里茲涅夫平時表現溫和，而當捷克人民爭取自由運動高漲之時，他却使用了史達林很少使用而赫魯雪夫曾用之於匈牙利的暴力手段。因之，蘇聯控制東歐的形式可能變化，本質則一貫不變。蘇聯控制東歐的主要手段分三大類：軍事、經濟與政治思想。

在軍事上，蘇聯控制東歐的機制是華沙公約組織的聯合武裝力量，其最高統帥及參謀長等主要職務皆由蘇聯將領擔任。表面上，此一東歐多邊軍事聯盟體系的設立是針對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一事實所作的反制措施。但是，華沙公約組織成立的真正理由則是蘇聯為其武裝部隊長期駐留東歐製造合法的依據。目前，蘇聯在東歐境內共駐有三十一個陸軍師（約五十六萬五千人）。在東德駐留十個坦克師、九個摩托化步兵師、一個砲兵師（約三十八萬人）；在波蘭，兩個坦克師（約四萬人）；在匈牙利，兩個坦克師、兩個摩托化步兵師（約六萬五千人）；在捷克，兩個坦克師、三個摩托化步兵師（約八萬人）^⑩。

華沙公約第五條規定，華沙公約聯合武裝部隊的目的是，強化東歐的防禦力量「以保衛各國人民之和平勞動、保障其領土之完整，並防禦可能的攻擊」。然而，一九六八年八月，這個聯合武裝部隊却軍事干涉捷克內政。一九八〇與一九八一年波蘭自由工會運動期間，蘇聯雖然沒有出兵干涉，但作出不少軍事示威活動。例如，一九八〇年十月，在波蘭一小時總罷工期間，蘇聯在格但斯克（Gdansk）部署一個海軍特遣隊。十月底十一月初，蘇聯軍事力量在波蘭邊界附近進行軍事演習。十一月底，蘇聯把波蘭情勢與一九六八年捷克「反革命」事件相提並論，並與東德、捷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還有很多其他跡象顯示，蘇聯在準備一次軍事干預。至少，軍事上的姿態可造成政治上的壓力，使事態的演變不致太離譜。

一九八一年三月，華沙公約組織在波蘭、東德、捷克及蘇聯境內舉行「聯合八一」春季聯合演習。這次聯合軍事演習對波蘭國內情勢也許沒有特殊意義，但是却含有更深遠更普遍的重要性。華沙公約組織多邊軍事演習在這個意義上至少有下列三點作用：（一）防止東歐國家學習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榜樣採取獨行其是的防禦戰略；（二）增進蘇聯在東歐進行快速、大規模的干預行動；（三）加強蘇聯動員東歐國家軍隊的能力，使東歐國家能及時派遣軍隊對聯合干涉行動作象徵性的參與^⑪。

在經濟方面，蘇聯控制東歐的主要機制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經互會成立於一九四九年，旨在反制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阻止東歐共黨國家參加西方的戰後歐洲復興計劃。後來，蘇聯為加強對東歐的控制，而試圖在經互會成員國家

註⑩ 〔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軍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 1983-1984*）（London: IISS, 1983），第十六頁。

註⑪ 鍾士，同前引，第一三〇頁。

內推行「國際勞動分工與生產專業化」，當時因為若干國家反對未能徹底推行。一九七一年經互會第二十五次大會通過了「經互會經濟一體化綜合綱領」，預定在十五至二十年內實施。

在經濟與科技領域內，加強發展東歐國家間相互合作關係是蘇聯對外政策與外交的主要方向之一。經互會合作的方式包括：(一)各國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相互配合。(二)聯合計劃與長期合作綱領：前者如「友誼石油管道」、「和平電力輸送系統」、「兄弟天然瓦斯管道」，火車貨運車箱集用等；後者則有「能源、燃料及原料長期合作綱領」、「農業及食品工業長期合作綱領」、「機器製造長期合作綱領」等。(三)雙邊及多邊協定：據統計，在經互會國家間，關於生產專業化的雙邊協定超過一千個，多邊協定也有一百多個。經互會國家間，約有三千五百家工廠保持直接的生產聯繫^②。(四)相互貿易：在經互會東歐各國的對外貿易中，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係對蘇聯；而蘇聯對經互會各國的貿易額，佔其對外貿易額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七十年代內，蘇聯因同西方和解，對東歐國家貿易額的比重相對減少；八十年代初，東西關係惡化後，又逐漸回升。例如，一九七〇年時，蘇聯對東歐貿易佔其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五點六；一九八一年，已降為百分之四十七點五。一九八二年回升至百分之四十九；一九八三年達百分之五十一；一九八四年上半年已超過百分之五十四^③。

今(一九八四)年六月，經互會在莫斯科舉行高峯會議，討論進一步合作的基本方向，並決定將採取新步驟以加強各國經濟政策的協同一致、集體制訂解決重大經濟問題的方法、共同確定在科學、技術、物質生產及基本建設方面直接配合的道路。東歐各國黨政首腦共同聲明，在發展經濟合作與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上，經互會各國共產黨與政府加強集體工作與交換經驗是有利的，因此決定定期舉行高峯會議以協調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方向與加深國際社會主義勞動分工^④。由於東歐各國對蘇聯能源與原料的依賴、經濟發展遭遇困難、以及東西關係惡化，使蘇聯對東歐各國的經濟控制力加強；如依目前的趨向發展，經互會經濟一體化將可能編織一個由蘇聯所控制的經濟蜘蛛網；任何一個東歐國家，一旦觸入，將難以逃脫。

在政治與思想上，蘇聯利用東歐各國共產黨為其主要工具。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控制機制，因此其方式頗不單純。蘇聯駐東歐的外交人員、貿易組織、文化團體等皆是蘇聯控制東歐各國的工具，而直接控制各國黨魁又是控制各國共產黨組織的主要方法。蘇共認為，「兄弟黨的合作乃是社會主義大家庭國家一切相互關係的核心」。社會主義國家一切相互關係的發展在決定性的

註② 巴爾科夫斯基，「直接聯繫」，〔消息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第五頁。

註③ 〔蘇聯對外貿易——一九二二至一九八一年〕(Vneshnaya Torgovlya SSSR, 1922-1982) (莫斯科，一九八二)，第十六頁；〔蘇聯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八四年第三期附冊，第一頁；〔經濟報〕(Ekonimicheskaya Gazeta)，一九八四年八月，第三十四期，第十九頁。

註④ 「經互會成員國家關於進一步與加深經濟與科技合作基本方向之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第一、二頁。

程度上依賴兄弟黨相互關係的情況與水平^②。易言之，共黨國家之間的黨與黨的關係超越政府與政府關係。一九四七年，蘇共曾組織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以便在政治上控制東歐^③。可是，維持不到九年就已解散。顯然，控制東歐以及其他共黨國家共黨的工作已由蘇共中央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及工人黨聯絡部」負責，現任部長為魯沙可夫（K. V. Ruskov），他也是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各東歐國家亦有相應組織，其領導人在黨內地位皆相當高^④。此外，各共黨國家共黨中央書記定期（約每半年）舉行集會，討論國際、黨組織工作及意識形態等問題^⑤。據說，史達林死後，蘇共對各國共黨已經不是由上而下以命令控制，而是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少數服從多數的決議^⑥。

此外，東歐各國共黨魁尙可在華沙公約政治協商會及經互會高峯會議中共議大事。布里茲涅夫執政時，從一九七一年開始，每年夏天邀請東歐各國共黨領袖至克里米亞會晤，各就本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建設進程、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國家間之全面合作」相互磋商，並就國際問題交換意見。起初，集體邀請；後來，個別會晤。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上說：「這些年來，在克里米亞舉行了三十七次高層友好會晤。在沒有外交禮儀的形式下，在同志般的氣氛中，我們討論我們關係的前景及世界政治的關鍵問題」^⑦。蘇共自認這是「團結」兄弟黨的很好方式。

新背景下蘇聯對東歐的新政策

進入八十年代後，蘇聯與美國關係惡化，西歐再一次成爲蘇聯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蘇聯認爲，蘇聯與東歐國家團結一致是使國際力量對比有利於蘇聯集團的主要因素。同時，蘇聯領導一如既往視其在東歐集團的霸權範圍是其維持世界超強地位的基礎，因此蘇聯必須利用各種一體化政策措施以維持其對東歐各國的穩固控制^⑧。

註② 奧斯托雅·奧夫夏尼等主編，「社會主義外交」，第四十九頁。

註③ 史塔爾（R. Starr），「東歐共產黨政權」（*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4th Ed.）（Stanford, Cali.: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2），第四版，第三二五頁。

註④ 同註③，第三三三頁。

註⑤ 「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會談」，「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Problemy Mira i Sotsializma*），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十九頁；「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四頁。

註⑥ 史塔爾，同前引，第三三三頁。

註⑦ 「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對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所作的蘇共中央總結報告」，「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頁。

註⑧ 鐵姆爾曼（H. Timmermann），「共黨情報局及其在蘇聯對外關係中的後果」（「Das Kominform und Seine Folgen in den Sowjetischen Aussenbeziehungen」），「西德聯邦東歐與國際研究所報告」（*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Köln, 1984），一九八四一八，第三一四頁。

另一方面，東歐集團內部也發生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危機。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原本要使人民大眾有豐富的生活，如今這種信念業已幻滅，更談不上超越資本主義。所以在東歐各國家內，出現不同形式的意識形態危機。在政治上，東歐各國皆欲追求較大的獨立自主；同時，大部分東歐國家都覺得目前的政治戰略必須更張。但是，如何更改，則意見不一。經濟成長的萎縮是東歐各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⑳。如果經濟困難無法克服，則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將難以存續。

蘇聯政府認為，要克服這些困難，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加強合作與團結。因此，蘇聯共黨及蘇聯政府國際活動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加強其與東歐各國的合作與團結^㉑。

蘇共在擬制未來政治綱領時特別提到，在社會主義國家間將出現新的關係形式。關於「社會主義世界」的概念在過去二十年內歷經演變，已更能表明「社會主義世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在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間，在經濟、文化領域內，在解決社會主義發展任務的途徑與方法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蘇共辯稱：「我們曾以為，它將更加劃一，也是很自然的。」蘇共肯定，社會主義體系可以為社會進步與各國之間的和諧關係創造一切可能性。這種關係係以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為基礎，這類原則包括：無條件尊重各國主權，相互友好支持與援助。蘇共領袖強調，若欲使這些可能性成真，必須有正確的政策路線^㉒。

蘇共對東歐各國提出警告說，政策上的錯誤必須付出代價：共黨領導角色一旦弱化，就會偏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發展道路，黨與人民失去聯繫，就會出現一些冒稱代表勞動者利益的人，不反擊民族主義心態，就會出現政府與政府間的衝突。共產黨人和執政的共產黨的「神聖責任」是，不使現存的歧異妨礙合作的發展。蘇聯與社會主義大家庭有一個共同的見解：不僅需要擴大合作，而且需要提高合作的素質與效率。

要達到前述目標，蘇聯共黨認為必須做到三點：(一)進一步完善政治上的相互作用。華沙公約組織是這方面最佳的工具。蘇聯希望與東歐國家的政治合作將越來越緊密，當然在發展過程中應考慮到個別國家的特殊情況與特殊利益。同時，共同擬制的方針應該是兄弟國家意見與立場的緊密結合。(二)使經濟一體化提升至新的水平。目前，沒有經濟一體化，社會主義大家庭國家的存在就難以想像。在未來，一體化應該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有效，才能確保各國民族經濟的強固。(三)在精神生活領域內，應當更進一步進行「思想上的相互接近」、「統一感與歷史命運共同感的加強」、「文化珍品交換的擴大」。蘇共當局相信，東歐國家間社會發展水平越高、越接近，則其相互了解越深，合作越密切與深刻^㉓。

註⑳ [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 Tribune)，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二頁；十五日，第七頁；十六日，第十四頁。

註㉑ [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六日，第二頁。

註㉒ 同註㉑。

註㉓ 同註㉑。

簡言之，在目前及可預見的將來，蘇聯對東歐的政策目標是：加強政治合作，共同擬制政策方針；加強經濟一體化，共同解決經濟困難；加強思想靠攏，建立歷史命運共同體。這些措施將使東歐集團內部趨向統一化，使它們更加依賴蘇聯。蘇聯追求這些目標的各種手段不變，祇是運用的優先次序會按當時主觀與客觀形勢而有變更。在一般情況下，蘇聯將以使用經濟手段為主，少用政治壓力，避免軍事干預。

結 論

蘇聯過去視、今後仍將視東歐地區為其安全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勢力範圍。從這個觀點出發，在蘇聯對東歐各國的政策與外交行為中，安全考慮往往重於意識形態，後者為前者服務並為前者製造合理的藉口。因此，東歐各國若能維持其社會主義社會體制，且能確保國內的安定，蘇聯可以有限度地容忍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差異。

在八十年代內，蘇聯對東歐政策的重點是：(一)在政治上，注意東歐各國政治領袖繼承人的選擇，防止狄托、齊奧塞斯庫、霍查這類人物的繼續出現；(二)在軍事上，強化華沙公約組織聯合武裝的力量，維持對西方的優勢；(三)在經濟上，擴大國際勞動分工與生產專業化，邁向集約化生產以解決當前各國經濟困難；(四)在意識形態上，強調共黨的領導角色，加強思想教育，特別是對年輕一代，以對抗西方的思想^⑤。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四頁。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 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國外：平寄美金八元
航空美金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